

重点推荐

三味斋

《平遥话》:

人物刻画和语言表达的新尝试

□张 平

小说。《平遥话》是他最新的一部,想来是自己比较满意,才把作品寄给了我。作为中学校长,刘伟波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,既值得尊重,也令人感慨。一位中学校长能连续写出几部长篇小说,着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。

有朋友推荐,加上作者的身份,我在阅读前便已有较高的心理期待,读过之后却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书中扑面而来的浓郁地方特色、底蕴厚重又流畅从容的文字,以及对故事架构的精准把握,都显得朴实自然又璀璨生辉,足见作家不俗的功底与才情。行文间龙跃凤鸣之气尽显,警句信手拈来,思想深邃且笔法自然老到。悬念伏笔的设置、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,更令人惊讶。毫不夸张地说,《平遥话》应当是山西文坛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,是一部极具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。作品的主人公可算作一位晋商。近几十年来,晋商是山西作家笔下的重要题材,《白银谷》《乔家大院》《立秋》等诸多描写晋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早已深入人心。而刘伟波笔下的晋商却另辟蹊径,选择了完全崭新的角度——他刻画的并非当年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票号财东、大掌柜,也不是雄视商界、纵横捭阖的大庄主,只是一个15岁时误打误撞来到平遥城闯荡的孤儿。这个孤儿因缘分会赚了些小钱,充其量不过是略有成就的小商人。但小商人在商海中的无奈与挣扎、梦想与执着、悲怆与困苦、磨难与抗争,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选择这样的视角,以小见大、见微知著,或许更容易让人产生共情与共鸣。这些人物同在一片天空下,传承着相同的文

化基因,也共同承受着历史变迁、社会动荡带来的生活与生存压力。《平遥话》里的角色都是平民百姓,是一群怀揣梦想却只能拼力苟存的凡夫俗子。他们的遭遇,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我们的上一代,乃至更久远的祖祖辈辈。

刘伟波笔下的晋商形象,或许有真实人物的原型,或许与他自己的家庭有关。这类素材其实并不容易把握,而作者能做到不过誉、不虚饰,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进行描摹与想象,实属不易。作品主要以叙述推进情节,虽没有过多的描摹与细节刻画,但通过故事的多重叙述,众多人物依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刘元、杨掌柜、那二、桂馨儿、冀永年等角色,个个熠熠生辉、生动感人。在这些小人物身上,既有着勤劳、节俭、诚信、善良、坚韧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格,也存在畏惧强权、百般忍让、得过且过、任怨不争等劳苦大众普遍的人性弱点。作者在描写时并未居高临下地嘲弄或哂笑,而是以细腻深情的笔触勾勒,让这一大批小人物的文学形象因立体多元而更显生动饱满、鲜活感人。

作者没有选取晋商的辉煌时期,而是以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的近百年历史为时代背景。这样的取舍需要勇气与自信,也更考验作者的文学、政治、哲学功力及对社会的认知水平。《平遥话》以平遥古城为创作依托,融合了古城的历史与民俗风物,将众多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变迁紧密契合,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折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,融客观性、历史性、时代性、艺术性于一体,全面再现了末代晋商的血泪历史与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。

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评价:“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,它保存了其所有特征,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、社会、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。”如何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是一个厚重的历史课题,《平遥话》通过讲述一批生活在平遥古城的小人物的命运浮沉,立体展现了一个悲壮的时代,这对于山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,是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《平遥话》的叙事语言简练平实、从容而富有韵味,这对于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方言运用而言,是一次令人欣喜的求索与努力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,更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。作品不仅大量运用平遥古城的方言土话,还以方言词汇作为章节标题,既引人入胜又独具一格。作者探赜索隐,从大量经史典籍中考证方言俚语的出处,并广泛与东北话、山东话、四川话、客家话、苏州话、西安话等各地方言词汇进行对比关联,这一做法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受众群体,更印证了古汉语在不同地域的传承与流变,对乡土文学、方言文学乃至农村题材、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,都具有借鉴意义。以俚语词汇作为作品的经纬架构,形式新颖独特,《平遥话》的出现堪称一个优秀范本。

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,刘伟波抽时间完成这样高水平的佳作,确是难能可贵。作为他的校友,作为同操晋语的山西老乡,我在此为他作品的出版发行致以诚挚的祝贺。
(作者系作家)

唤醒生活饱含的诗情

——评卢文丽诗集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

□子 道

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《诚斋荆溪集序》中所说:“步后院,登古城,采撷杞菊,攀翻花竹,万象毕来,献予诗材,盖麾之不去,前者未觝,而后者已迫,焕然未觉作诗之难也。”诗人卢文丽这本新出的旧体诗集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也充满了生活的诗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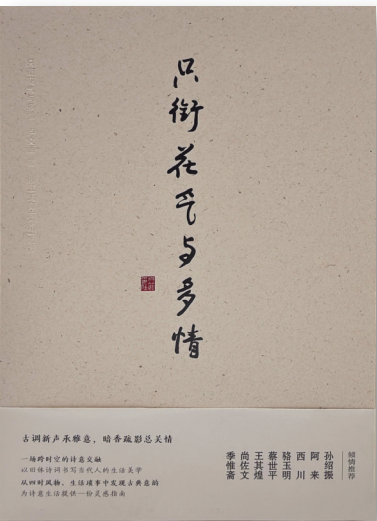
从观戏到饮食,从插花到茶话,从旅游到应酬,从日常居家到节气变化……该诗集多方面表现了诗人丰富的生活情趣,加之不少诗前都附有序,更让我们有了具体的感受。如《芙蓉香中偶得》的小序言:“过北山路,芙蓉盛放,香远益清,契手吾心。”读来已很有味道。此外,我想她作诗应该也如诚斋所言“浑然未觉作诗之难”,不少“偶得”“即兴”“有感”之诗,信手拈来,畅快恣意,即刻就能与眼前事物发生诗意的、深厚的联系。

在诗集的跋里,卢文丽说:“写旧体诗,是自然的生发,是生活的调适与点化。”她之前多因现代诗而被大众熟知,但相较于现代诗可能被赋予很多期待和抱负,写旧体诗于她而言更加从容,不硬写也不功利,词句显得闲适自如。“村墟蚕豆绿,野渡杂花欢。老少梳篮髻,溪滩挑马

兰。”(《谷雨食马兰》)这类五言绝句尤其能体现出一种“清欢”之味,也因其短小干练而能在生活的琐碎、繁芜中游刃有余。亦如“随手插花乱,人花两适安”(《插花》)、“秋月怜丹桂,中宵忆到明”(《白露》)等。诗人用词简洁却不俗,少夸饰和用典,直抵人心,颇似王国维所说的“不隔”之意:淡语皆有味,浅语皆有致。

当然,诗集中也有不少精致之作,体现了不凡的气象,《秋分》“雷始喑声南去雁,雨方敛翠晚吟虫”打开眼界,后乃有“四时风月皆堪念,万里江山总不同”的感慨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,切勿迷失在诗人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里,而错过了其中隐约透露的大境界。如何从个人庸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种超越日常的感悟和观念,并反过来指引我们更好地生活,不仅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,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创作的真谛。正如《观戏有得》中“凝眸台前观戏文,岂知已是戏中身”之意,观戏所能体验的戏剧性处境,并不仅限于舞台之上,更表现在表演和观看、角色和观众、戏剧和现实之间的虚实相生、主客互换。同理,我们读诗、生活也是如此。

我想,可能正因为卢文丽有创作现代



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,卢文丽著,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2025年6月

诗的经历,她在处理旧体诗时更能收获一种连通古今的意识,以旧写新或将新写旧。在《遣闷一首》中,她曾这样“自嘲”——“忆昔青春年少时,由缙信马写新

诗。晚来回首弄平仄,湖山逢君笑我痴。”从“青春年少”到“晚来回首”,指向了不同人生阶段背后,阅历的沉淀所引起的思想、气质的转变。在诗的新旧和人的老少之对比下,“痴”更像是一种大智若愚、以退为进。中国的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发生以来,到如今刚过百年,与千年古诗的传统相比,确实还像是处在摸索和成长的“青春期”。

诗人的中年回首,自然更容易亲近沉稳、老练的旧体诗。在《追和杜工部(秋兴八首)(其四)》中,诗人以“今古樵柯一局棋,百年疏忽熟知悲”起兴,这种贯通古今的感发,似乎只能借由旧体诗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达,也似乎只能在诗人拥有一定的人生沉淀之后,才能和杜甫的诗句起更深的关联。由此出发,卢文丽的旧体诗创作启发我们,“传统”并非只是放在博物馆里展示的“器物”,更是一种感知事物的能力。读诗、写诗即察觉世界、体悟生活的一种视角和方式,可以时刻发生在日常生活里,“活”在每一个有诗情的人心中,而且可以对接悠久的历史,激活起传统但依旧新鲜的感受力。

整本诗集中,有一首名为《秋夜试纸》的诗,让我印象深刻,其写道:“檐雨秋声试新纸,棉柔初糯自多姿。犹闻小满青青竹,倾向窗前争赋诗。”新纸的质感正如世上万千事物的状态,留待诗人去书写;这书写的过程既像创造,也像回溯——新纸可以还原为“青竹”,而事物本就饱含的诗情,也等着我们去唤醒。
(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以滋味铭记乡土

——长篇散文《父恩》读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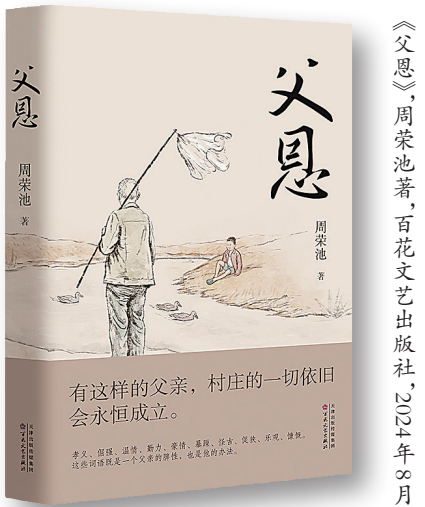
□黄 诚 王凌晖

什么希望,更谈不上有什么失望。它自己有股干劲,偏要像模像样地生长,最后结出一树不如人意的果子”。生活虽没什么起色,可即便如此,父亲种的桃儿还是给“我”的童年添了一丝甜蜜。他“总想想办法吃点儿好的”,这种生活态度始终支撑着他,磕磕绊绊走过曲曲折折的一生。这是一代父辈的缩影,是无数农村父亲与土地的挣扎相忆,也是无数父辈付诸一生的苦中作乐。

辛辣透明的酒液,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父亲的性格。正如作者自己所说:“父子之情多是暴躁粗糙甚至是对抗的,又是真实而深切的。”这种复杂的情感融注于碗盏之中,最终酿成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的醇厚绵长,实现了和解。可这样的豪情,终究随着岁月增长、城镇扩张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且不说喝

酒的“碗”换成了“杯”,单是酒液中掺入的“盘算”,就早已让酒事变了味。大碗喝酒、酒花四溅的日子,在城镇化的轰鸣声中一去不复返,父亲的碗盏变得静默,无声传递着苍老的讯号。村庄在生长,父辈们却渐行渐远,过往的争吵、欢闹、悲伤、希望,都化作一杯陈酒,散发着平静的醇香,沉淀着深深的苦涩。

周荣池出生于江苏高邮,谈到高邮,我们不禁联想到汪曾祺。两位作家同根同源,在乡土饮食的表达上却存在些许差异。汪曾祺的绝大多数文学创作取材于家乡,他本人对“吃食”的偏爱,营造出独特的饮食书写景观。在他笔下,饮食少有名贵之物,或一碗茨菇汤,或一盘拌菠菜,淡而有味,总给人以“美”的文学体验。例如《鸡鸭名家》开头,通过“一划”“一翻”“一统”“栗紫”“钢



蓝”“蕊黄”等词,将处理家禽的场景化作一场赏心悦目的艺术表演。周荣池的饮食书写,像一把冰冷的刀,平稳剖开“田园牧歌”的表皮,露出颤动流淌的血肉,呈现出一种纯粹的“真”,让抒情性与现实性交织共生。如《作乐》一章中,父亲杀煮小公鸡的画面堪称经典:“滴”“晃荡”“溅”等动词裹挟着血色与混沌,营造出昏暗的氛围,食

铁流的小说《弥合》发表于《山东文学》,后被《小说选刊》2024年12期转载。作品讲述了退休后陷入心理应激状态的老王,如何从一只泰迪犬身上寻找慰藉,又如何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更深层亲情困境的故事。这篇小说的力量,潜藏在家长里短的平淡叙事下,那是一种锋利的思考:从抗拒宠物狗到依赖它填补空虚,老王最终在病床上发现,家人因沉迷宠物而忽略了他的生死呼救。当人们将情感过度寄托于宠物时,可能削弱自身在真实社会关系中的参与能力,人与至亲的血肉联系被毛茸茸的温情悄然替代,这映射的正是当代社会微妙的价值扭曲与情感失衡。

老王退休后的日子,是无数城市老人的缩影。离开熟悉的机关办公室和“处级”的体制身份,他被抛入巨大的生活空窗。护士一句无意的“大叔”,电梯里小女孩一声友好的“爷爷”,都让他如坐针毡,难以接受自己已然老去的事实。更深的失落来自家庭:儿子大宝一家因宠物狗泰迪的待遇问题,在餐桌上与老王决裂,一顿家常饭不欢而散,以至数月不相往来。在老王眼中,宠物狗上桌不仅僭越了餐饮礼仪,更篡夺了本应属于子孙的情感位格。当大宝夫妇数月不上门,老王在空荡的客厅踱步时,楼上此起彼伏的狗吠声,更像是对他无处安放的心结的群嘲。老王的心态固然体现了老一辈固执的代际认知,但其背后更多的是对儿子情感重心转移的无力感。

然而,由于孙女毛毛的坚持,小狗泰迪得以进入老王家,甚至登堂入室,戏剧性地成为老王情感荒漠中的一抹绿色。起初,老王视它为人入侵者,但这条小狗以灵特有的方式渗透进他的生活:它会察言观色,怯生生地靠近,被呵斥后便默默退开,那神情意外触动了老王心中的柔软之处。当老王感冒厌食时,泰迪竟叼来自己的狗粮放在他枕边,前爪合拢作揖恳求——这笨拙的关怀,深深打动了心思无着的老王。老王迅速沉溺其中,他“霸占”了照顾泰迪的权利,与狗互动时眉开眼笑,甚至和妻子展开“养狗竞赛”。在泰迪身上,他重新找到了被需要的价值感,开始戏称泰迪为“孙子”,享受着这种简单纯粹的情感反馈,却未曾警觉:真正的儿子大宝,在他心里已被挤到了角落。

小区遛狗场成了老王的新社交圈。朋友老乔一语道破:“现在的人呀,联系越来越方便,见面也不难,可心咋就越来越远呢?”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,还不如养个狗、养个猫亲密。”这句话揭示了现代人的普遍困境。我们拥抱宠物,只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际交往中稀缺的要素:绝对忠诚、无需复杂经营的情感回馈、永不背叛的陪伴。“老王们”将对儿女的期待、对亲密关系的渴望,甚至对自我价值的证明,一股脑倾注到不会言语的生灵身上。泰迪们摇尾的殷勤,成了对抗孤独的速效药。

只是,这剂药有着致命的副作用。老王不慎摔倒昏迷被送急诊,命运的讽刺在此达到高潮:妻子刘红正在“养狗心得体会交流会”上侃侃而谈,手机屏幕亮起“老公”来电,她随手挂断,唯恐打断发言;儿子大宝正为丢失爱犬“零零”心急如焚,满城张贴重金悬赏启事,同样掐断了父亲生死攸关的呼救。这极具冲击力的戏剧性一幕——老王曾痛斥儿子“认狗作父”,如今自己深陷狗带来的温情,而家人正以他曾不齿的方式,将一条狗的生命置于垂危至亲的呼救之上。更大的反讽紧随其后:老王醒来后,唯一能拨通的电话来自生命垂危的弟弟。弟媳的哭诉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:弟弟早已知晓自己身患癌症,却因怕影响哥哥“刚好好了”的心情而隐瞒病情。他曾在老王“忙着撸狗”时多次致电,均未获回应。弟弟在病痛中守护着哥哥虚幻的“好心情”,而老王在泰迪的温柔乡里,浑然不觉亲情的血脉正濒临断裂。老王对弟弟的疏远,表面是“心情好了”的托词,实质是情感份额已被怀中的泰迪稀释殆尽。至此老王方才惊觉,那些被泰迪舔舐过的温暖日常,不过是亲情的赝品。

小说情节线性推进,叙事却不缠绕,却寓言化地呈现了当下社会情感异变的完整链条:年轻人因都市生存压力转向宠物寻求快适的情感慰藉,老人因家庭空巢化依赖宠物填补空虚。铁流并未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,而是冷静呈现了老王们的困境:在日益原子化、情感连接变得脆弱的当下,宠物的温暖是真实且诱人的,心理学研究也已证明,宠物的情感支持甚至可以比人类支持更为有效。但是,就像人们所调侃的“猫狗是宝贝,爸妈是累赘”,这种亲密关系的位次僭越,是否也是一种过犹不及?

《弥合》通过老王一家的遭遇,迫使我们正视这个核心问题:对宠物的爱固然可以成为一种便捷有效的情感寄托,但事实上也在习焉不察中瓦解着我们经营更复杂、更深刻人际关系的意愿与能力。人人都想从宠物身上索取纯粹的情感,结果却是连最基础的血亲责任都被漠视。无论如何,牵狗绳的柔软舒适,不应成为我们松开情感纽带的理由。因为当真正的风暴来袭,能穿越生死给予支撑的,大概率不是怀中的泰迪,而是那根可能已被我们无意间剪断的、连接着至亲的心线。这是老王用伤痛换来的领悟,也是小说留给每个现代家庭的警世寓言。
(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)

物的香气与温度被抽离,这场无法宣之于口的口腹盛宴,因来源不正当而透着隐秘的惶恐与压抑。由此可见,周荣池书写乡土时,从不回避村庄的另一面;但他并非仅将目光凝聚于此,也会抬头注视光亮,他写父亲为受伤的母亲煨出乳白的鸡汤,写父亲为难得返乡的儿子将猪头烹成一桌盛宴,笔下皆是村庄里沉默、寻常却真切的爱意。从“美”走向“真”,周荣池塑造了一个“虚拟而又真实的村庄标本”,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以往的“文学高邮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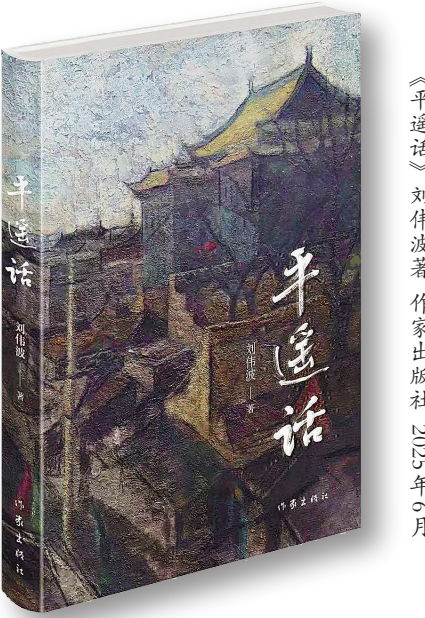
周荣池笔下有橘子的酸、烈酒的辣、茨菇的苦、腌肉的咸;而其中的甘蔗、桃儿、西瓜,看似甘甜,却总萦绕着些许苦味。或许唯有“苦”,才能让父辈们始终攥住那些看不见的岁月,守住村庄。正如他所说:“有这样的父亲,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成立。”而有这些烙在唇齿间的滋味,通往故乡的记忆便不会丢失。即便岁月与时代的变迁让村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面貌,南角墩仍在顽强地生长,直至连成一片,成为我们永恒的精神原乡。

(作者黄诚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,王凌晖系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牵狗绳与电话线

——读铁流小说《弥合》

□马 兵



《平遥话》,刘伟波著,作家出版社,2025年6月

《平遥话》的作者刘伟波,是经朋友举荐认识的。他正值壮年,是我山西师大的校友,现任太原市一所中学的校长。一般人小时候多半有过作家梦,伟波似乎也不例外。当初考大学填报志愿时,他顾虑重重,担心自己写不好文章、才情不足,居然放弃了一直向往的中文专业,选择了更偏重于理论学习的政教系。其实山西师大的政教系实力雄厚,在全国同类高校中一直名列前茅,享有盛名。如今看来,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工作和事业打下了更坚实、更广泛的基础。

刘伟波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,但文学写作的欲望、当作家的想法始终没有消退,工作之余,他已创作了3部长篇